

16.12.

卢氏文史资料

曹靖华题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卢氏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34

卢氏文史资料

(第三辑)

2017.8.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卢氏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卷前寄语

县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在中共卢氏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市、县政协领导同志的关怀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得到了顺利开展。《卢氏文史资料》第一、二辑问世后，受到了许多同志的赞许，还收到不少卢氏在外地工作的同志来信，鼓励我们把家乡文史资料的征编印行工作坚持下去，用力办好。

在压力和动力面前，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第三辑的组稿和编辑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劳动，现已脱稿，如期付印了。

本辑编入各类文稿三十二篇，十万余言，内容比较翔实，可读性强。有祝更生、许天民同志的回忆录，这两位乡情浓郁的革命老人，忠实地记述了在不同战线上各自走过的道路；有赵群一、郝印吾等几位革命前辈，于解放初期战斗在我县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有抗日名将李振西先生的遗作，详细记述了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驻卢期间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情景；有王黎晖同志于病

中从北京给我们寄来的“为山区点燃抗日救亡火炬”这一亦属难得的文稿；有莫肇基等同志撰写的民国时期农民围城赶赵团、二十年失城、打刘桂棠这些对卢氏人民留有很深记忆的历史事件；还有一组文化方面的史料。

编者热切期望第三辑《卢氏文史资料》能以产生好的社会效果；但限于水平，疏漏难免，我们也热切期望读者给予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卷前寄语.....	编 者 (1)
祝更生自述.....	(1)
有幸的机遇.....	江 繁 (22)
诱捕蓝琛.....	沈 群 (24)
《松阳党史通讯》摘抄.....	(27)
我在隐蔽战线上走过的道路.....	许天民 (29)
浴血奋战石大山.....	李振西 (69)
我看到的石大山之战.....	王志超 (80)
为山区点燃抗日救亡火炬.....	王黎晖 (82)
敞开进军陕南的大门.....	柳 荫 (90)
解放初期卢氏的拉锯斗争.....	郝印吾 (94)
痛击李自魁.....	赵群一 (113)
石龙头寨突围记.....	吴国庆 (118)
卢氏农民三次围城驱赶赵团记略.....	李啸东供稿 (121)
李仲美传.....	颜 毅 (123)
民国二十年卢氏失城记事.....	莫肇基 (126)
颂陕西警备师马师长剿河南卢匪五言吟.....	薛纯德 (129)
官民同心打退刘桂棠.....	刘景和 (131)

从新卢书店到新华书店.....	莫肇基	(134)
书画漫录.....	莫肇基	(136)
古时“马蹄”近代诗史.....	常好廉	(140)
谈“高村古渡”.....	李思靖	(141)
卢氏城隍庙.....	牛树森	(144)
蒲剧在卢氏.....	周建中、贾震	(147)
小史料几则.....	摘自《城关镇志》	(153)
学生奋起斗县长.....		(153)
争民主，殴打县参议.....		(154)
反掉钱粮桌.....		(155)
赶走厘金局.....		(156)
打倒烟土局.....		(156)
补白		
房公祠.....		(146)
神禹导洛处.....		(158)
张士贵故里.....		(158)

祝更生自述



编者按：祝更生同志是我县朱阳关乡人。现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副主任委员、杭州市主任委员暨市政协副主席。祝老今年已八十二岁高龄。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祝更生自述》，是一九八三年八月祝老撰写的回忆录手稿。现刊出，以飨读者。

一、童年

一九零七年农历一月二十四日，我出生在河南省卢氏县朱阳关一个农民家庭。世代耕读传家。父亲号延芳，母余氏，生两子，我居长。弟夭亡。我年五岁，母亲即不幸去世，依继母曹氏抚育成长。八岁进私塾，旋转祝氏初级小学，随外祖父曹培元读书。外祖父为清时秀才，但不守旧，关心时事，诲人不倦。鲁迅先生曾为他写了碑序（载鲁迅且介亭集，石碑立在五里川中学校园）表彰他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当我跟外祖父读书时，舅父曹靖华在外留学，经常寄

回进步书刊，外祖父对我和同学详为讲解，开拓了视野。外祖父培元老人并教导我说：“男儿立志，应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切莫孜孜于个人名利。”我终身奉为圭臬。

一九二四年，我就读卢氏县高等小学。在当时，这个学校算是全县的最高学府。三年毕业，全班成绩我居第一。

二、投笔从军，参加北伐

高小毕业后，我原想到开封升学，因家境贫困，未能如愿。当时，正是军阀混战之际，饿殍遍野，股匪流窜，奸掠焚杀，弄得家家骨肉离散，流离失所。加之，帝国主义任意欺凌，国不成国。我目击时艰，心切救亡。适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北伐，他宣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高举国民革命旗帜，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对此我颇有所感，即欣然投笔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冯玉祥部（当时冯玉祥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参军，在豫东一带投入了歼灭奉鲁军阀的各次战役。部队办起了政治训练班，主要课目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党史等。我被抽调到训练班受训，由于我初出学校，年轻幼稚，缺乏政治识别能力，误以为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党，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主义，国民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就和训练班同学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谁知我所参加的那个第八方面军，原来就是“镇嵩军”刘镇华的部队所改编。军行所至，任意抢劫民财，民怨沸腾。如此国民革命军，民实不堪其苦，何言救国？

三、醉心农村自治

一九二七年冬回家奔父丧之后，我不愿再回原部队。听说山西“农村自治”搞得很好，物阜民康，秩序井然（这是道听途说，实际并不如此）。所以我就倾心农村自治，幻想以农村自治，富国强民。一九二八年初，河南省创办“农村组织训练处”培训农村自治骨干，我即欣然应考，由卢氏县保送到开封农训处教育科学习。结业后，我原打算回故乡以所学专业从事新农村建设，可是省政府却把我分到洛阳农村自治筹备处。由于当时兵荒马乱，我只是干些供应兵差的事，用非所学，使我大失所望。

四、二次从军，随冯讨蒋

一九三零年，我由原在部队工作的一位同事薛广汉介绍，由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派任国民党洛阳县党部整理委员兼训练部长。在洛阳县党部工作几个月，所接触的国民党上上下下，没有不是派别分歧、倾轧排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蒋介石更是专横独裁，残民以逞。说什么三民主义，救国救民，根本是骗人的把戏，于是我愤然联合友人崔济民（中共党员，曾任农业部土壤局长，现离休）、关周光（中共党员，曾任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第二次参加冯玉祥部队进行讨伐蒋介石的战役。只是冯玉祥所部将领受了蒋介石的离间，团结不固，以致失败。

五、情切桑梓，还乡服务

我常念卢氏故乡，地处熊耳万山丛壑中，交通阻塞，居民多安于畎亩，鲜闻外事。加之地富剥削，豪绅逞强，山民终岁勤劳而食不一饱，衣不蔽体，苦不堪言。自忖自己对治国安邦既力不从心，亦当为家乡出一把力，作一些事，改造山区环境，改善山民生活。因而我即于一九三一年初毅然回卢，先在国民党卢氏县党部担任常务委员，意在以此为基点，联络地方有志之士，从事于地方农林水利、交通、文教等事业的开展。可是当我回到卢氏触目所及，县党部人员和一些地方人士又多是营营苟苟唯个人名利是图，置地方建设事业于不顾。这就使我有孤掌难鸣之感。但我并不气馁。我建设卢氏的意愿，已引起地方多数群众的同情，我并不孤立。

六、兵变城陷，民罹荡劫

奔走呼援，恢复治安

一九三一年某月，驻卢氏国民党中央军独立旅王乃文部梁团，突然哗变，奸掳焚杀，民罹浩劫。当时我适因事赴汴，闻惊，即联合卢氏旅汴同乡会人士奔走呼援。杨虎城善军所部马青宛师到卢氏收复县城，我随援军通县。县长周斌，先为叛兵所俘，旋释回。我和地方群众团体咸认为县长守土有责，卢氏遭此兵劫，县长不能辞其咎，即由我领衔，电请河南省政府对县长周斌应加严办，以平民愤。同时，在省府未派新的县长到卢之前，由地方群众公议暂行推举陈士

凯（当时二十一路军秘书长临时回卢）、常沐瞻（教育界）、祝更生（县党部）等五人负责组成“卢氏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办理善后，恢复地方秩序。我们请省政府严惩周斌的电报去后，省政府即令马守宛师长将周斌解省讯办。而马师长解送周斌的士兵将周斌解至中途御关，即将周斌枪杀。马师长却电省政府说是被民团截杀。

七、深入基层，从事乡村建设

卢氏兵劫之后，百废待举，而我在国民党县党部虽身为常务委员，但却无建设地方之权，很难为地方建设作出实际效益，还不如在地方担任一个区长，可以掌握一区的地方实力，从事乡村建设比较实际。因此，我于一九三一年冬，放弃县党部的职位，下到卢氏县第三区——即朱阳关、五里川、汤河、瓦窑沟一带的西南山区担任区长。这在当时不识我者认为去尊就卑未免愚蠢。我接任区长之后，即针对当时地方实际情况制订建设初步规划，下定决心，从乡村基层建设做起。我了解到干部决定一切，要搞建设，首在培训干部，即分期分批集中乡村骨干加以训练。同时我感到，卢氏西南山一带民性强悍，动辄械斗，同室操戈，同室仇杀，时有所闻，殊为痛心。其所以致此之由，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教育落后。所以我担任区长不久，即约同热心教育人士以极大魄力，把久被豪绅所霸持、侵占的乡学产、庙产集中统一作校产，以朱阳关原有“义学”为基础，以关帝庙为校址，创办起卢氏县第三区区立完全小学（分初、高两级）。所有私塾逐步取缔。这样以来，就使西南山区及邻近朱阳关的内乡

县桑坪等山村的青少年也可就近受到高等小学教育。可是学校创办之初，师资即成大问题。就地取材有困难，于是，我即特邀我在农训处的同学楚香亭不远千里从豫东到朱阳关小学任校长。他办学有经验，这就为办好这个小学起了良好的开端。此后，我又从山西请来我在冯玉祥部队里同事关周光到校主教。关周光系中共地下党员，他即以这个小学为基地，传播革命种子。抗战初，他组织师生向群众宣传抗战，并募捐实物运到陕州慰劳抗日伤兵员。一个山区小学能有这样大的活力，故而远近群众都把朱阳关小学誉为熊耳山区一颗晶莹的明珠。朱阳关小学自一九三二年创办五十多年来，为革命培育了不少人材，如河北省教育厅长、党组书记祝庆理、中央水利电力部十二工程局骨干祝永科等，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但更重要的不在于几个学生的成名，而在于给卢氏地方上培养了一些四化建设的中层骨干。

八、两年系狱，乡村规划夭折

一九三二年夏，我到开封受区长训练。意外地遭到开封地方法院的逮捕。原因就是由于一九三一年卢氏县长周斌的被枪杀，他的家属指控我为主谋者。消息传到卢氏，全县民众都为我因公受累极为关怀，发起募捐并派代表住汴营救。在狱两年零三个月（一九三二年夏——一九三四年秋）终以查无实据，宣告无罪恢复自由。我在狱中，凡亲友探访，我无不以乐观的心情告慰他们，说坐牢就是锻炼，爱惜精神留他日担当宇宙。闻者咸以我意志坚强感到放心。我在狱期间，狱中发生严重伤寒传染病，在狱的人死亡枕藉，我亦被传

染。蒙旅汴乡友常志箴等向法院暂保到济汴医院治疗，生命幸得保全。缅怀乡谊深情，愧不知何以为报。

我乳名长泰，学名永英，号子才，出狱后改为更生，沿用至今。

开封系狱，使我至今感到遗憾的是，我勇于到故乡基层从事乡村建设的意愿和规划遭到夭折。特别是，如果不遭到这个挫折，我完全有可能通过地下党员关周光的关系，早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卢氏山区有利地势开辟革命根据地，早日为人民贡献力量，不至于走许多弯路了。

九、抗战军兴，奋起抗战

一九三四年，我开封出狱后，应友人约到皖南屯溪担任区长，旋转浙江于潜县工作。芦沟桥一声炮响，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我激于爱国救亡热情，即积极投入抗日斗争。

一九三七年秋，日寇长驱直入侵陷浙江省杭、嘉湖地区，气焰十分嚣张。当时我在浙西天目山麓于潜县，约合抗日志士一百余人建立抗日游击队，一度夜袭余杭日寇。当时余杭日寇，以为我大军反攻，城外守敌仓皇退守城内。我们对日寇这一突然袭击可以说是一开浙江游击队抗日之先声，显示了我中华儿女不是软弱可欺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到浙江诸暨县担任警察局长。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我竭诚拥护中共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当时，有杨思益、顾春林等二十位中共党员在诸暨工作，我即与他们紧密合作，积极致力于“二五减租”、组织农会、土枪队，发动群众、壮大抗战力量。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身份到浙东绍兴抗日前线视察抗日工作，路过诸暨枫桥。当时，我适任枫桥区区长，荣幸地担任接待工作。我到诸暨边境谢家桥地方迎接周恩来同志在枫桥召开欢迎大会。我陪着周恩来同志登台。周恩来同志对到会近两千人民群众作了“抗战必胜”的重要讲话，激励了会稽山区（枫桥地处会稽山麓）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热情。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为我写了“一切为了抗战”的条幅，特别勉励我要为抗战救国立功。我永远不忘周恩来同志对我亲切的教导。我在后来毅然决然弃暗投明，坚决倒向无产阶级，也就是在枫桥蒙周恩来同志这一次对我亲切教导，深深打下了思想基础。

十、做国民党的“官”，心向人民

八年抗战，我差不多有六年时间都是在浙江省诸暨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先是任诸暨县警察局长兼江东区区长。此后迭任诸暨县枫桥、璜山等区区长。特别当一九四二年夏诸暨沦陷后，我任敌后诸暨璜山区区长的时候，日夜与日寇及汪精卫汉奸组织作顽强的斗争（我任璜山区长时，即密与中共诸暨地下党有所联系），袭击日寇据点，消灭汪伪势力，扫除散兵游勇，维护社会治安，保持了沦陷的诸暨东乡会稽山区的一片干净土。同时，也使这一地区人民群众得以安居生产。这就引起了远远近近的人民群众对我的赞许和浙江省政府的重视。诸暨爱国民主人士斯烈先生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老师，他代表诸暨人民群众向黄绍竑主席推

荐我接任诸暨县的县长。我是一九四二年接任诸暨县长的。当时诸暨县城仍为日寇汪伪所侵占。我县政府在诸暨东乡吴子山区办公。蒋介石这时已公开反共，我身虽为国民党官吏，而心向人民，但又不能公开与中共交往，只能秘密联络。中共金肖支队密派代表史济中（原名施竟成现任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为总务主任名义掩护，常住在县政府坐地联络，互通声息，共同对敌。

十一、抗日胜利，诸暨受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抗战八年终于获得胜利。历史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对抗战形势的估计无比正确。我接上级通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某日率全县抗日武装由山区回诸暨县城。当时日寇在诸暨尚有一个大队，汪精卫的汉奸县长已畏罪先逃。我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位代表进城时，日寇头目出城迎接，俯首帖耳听从我们安排。按照确定的受降仪式和时间，日寇即把他们所有在诸暨的武器装备及财产等一一造具清册，由我代表中国浙江诸暨地方政府光荣受降并接收。往日残暴凶狠的日寇，今天已如丧家之犬。抗战八年，我们的牺牲是大的，可是我们最后胜利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当受降开始，日寇代表把所造财产清册呈交给我时，他说：“我们留在诸暨的财产很多，现在都造册送给你们，请你们清点。”我当时讽刺性地回答他们说：“不是送而是还！这财产本来都是我们中国的嘛，应当说是‘物归原主’。”日本代表脸红了，只好点头说“是”。

十二、松阳率部起义，倒向无产阶级

早在一九三零年，我对蒋介石的专横、独裁，即怀不满，故曾一度参加冯玉祥将军的反蒋斗争。在日寇入侵，国难严重，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时，蒋介石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了，毛泽东主席以民族最高利益为重，冒着生命危险，亲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签定了“双十协定”。全国人民原期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医治战争创伤，共同建设祖国，而蒋介石却一转眼撕碎了“双十协定”，仰仗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发动全而内战，又陷人民于水火之中。这一切使我对蒋介石更加痛恨。这时，我舅父曹靖华在南京中苏友协工作，听说我在诸暨当国民党的县长，即亲自到诸暨对我进行革命形势教育。他叮嘱我应当看到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伟大事业如旭日东升。这更使我下定决心倒向无产阶级，参加人民革命解放斗争。我通过舅父曹靖华与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张执一在上海秘密接触，准备在浙江诸暨武装起义。我为了更好地掩护在诸暨的起义活动，于一九四九年秋，利用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周兆棠和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相识的关系（周兆棠、蒋鼎文都是诸暨人，我是诸暨“地方官”，他们回家探亲，我作为地方官对他们应酬一番而相识），托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帮我活动定为国大卢氏县第一代表候选人（当时国大代表选举法规定，每个县的代表候选人须先由国民党中央圈定两人，即第一候选人，第二候

选人。一般说，凡是经国民党中央圈定的第一候选人，地方政府必须保证其当选。卢氏县当时国大代表候选人圈定我为第一候选人，薛澄清为第二候选人。薛当时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且为CC派重要骨干，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全力支持薛和我竞选。我由于有蒋鼎文的大力帮助，且早年因公受累，故而地方人士绝大多数投我的票。结果，我即当选为卢氏县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一九四八年春，我到南京出席国民大会，即利用这一时机，和舅父曹靖华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局张执一在永安公司七重天秘密会晤。我向他汇报了诸暨地方武装的实力，并表达了我坚决倒向无产阶级准备起义的决心。张执一与周凯曾亲到诸暨观察情况积极作好诸暨起义的准备。张执一、周凯并和我一同在杭州西湖船上共商起义大计。当时，张对我说，关于我和党接触准备诸暨起义的事，曾向党中央周恩来请示批准，中央指示，曹靖华先生介绍，可放心进行。当我正在积极布置诸暨武装起义的时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将我诸暨县长突然免职（主要是诸暨国民党在乡军人及地主恶霸结伙控告我在诸暨“剿匪”不力）。以致诸暨武装起义的全盘计划未将实现。这对我来说，真是霹雷震顶。但国民党反动派这种恶劣的手段，并没有吓倒我，相反，更加坚定了我投靠人民的意志。适在我被免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浙江省政府改组，沈鸿烈调走，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他虽系蒋介石委派，但他当时看到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他是力主和平，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故他一接任浙江主席，就筹划搞局部和平，靠向共产党（后因密谋暴露，被蒋介石带到台湾杀害）。我趁陈仪新到任机会，利用多年在浙江的人事关系，托新任民政厅长杜